

图文版

A color portrait of Deng Xiaoping, an elderly man with grey hair, wearing a dark blue Mao suit.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calm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.

MY FATHER DENG XIAOPING

邓林 著

我的父亲

邓小平 下卷

我的父亲

邓小平

图文版

邓林 著 【下卷】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父亲邓小平:图文版 / 邓榕, 邓林著. —2 版.

—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-7-5073-3553-8

I. ①我… II. ①邓…②邓… III. ①邓小平(1904~1997)

—生平事迹 IV. ①A7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00536 号

我的父亲邓小平

著 者 / 邓榕 邓林

责任编辑 / 张文和

装帧设计 / 北京阳光图文设计中心

出版发行 / 中央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西四北大街毛家湾 1 号

邮 编 / 100017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北京阳光图文设计中心

印 刷 /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787×1092mm 16 开 53.75 印张 400 千字

2013 年 1 月第 2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73-3553-8 定价:160.00 元(全三卷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CONTENTS

目 录

我爱我的父亲	001
爸爸	059
爸爸和妈妈	101
爸爸和我们	110
爸爸和我	175
后记	183

我爱我的父亲

郑小平

我的父亲

郑小平

1997年2月19日——爸爸走了，那么从容、平静、安详。

他是含着微笑远去了……

这一年，爸爸93岁。

日转星移，岁月如梭。

每当我走进我们家的院子，不禁思绪万千。算起来，爸爸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。爸爸是非常钟爱我们家的这个院子的。他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。这里的每一棵花、草、树木都已经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跟随着他的脚步，一天天长大，一年年成熟。当年那几棵石榴树，如今已高过房顶。到了秋天，果实累累，压弯了枝头，火红的石榴绽开裂口，露出一颗颗石榴籽，红白相间，像宝石般晶莹剔透。核桃、柿子、海棠、葡萄熟了的时候，引得小鸟、鸽子、灰喜鹊常来光顾。三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。还有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，伸向蓝天。那两棵油松，长得拙朴、苍健。一棵高，另一棵稍矮，枝叶互相拥抱着，并肩矗立，好像是我们的爸爸和妈妈相依相伴。我们



“双龙树”。

就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“双龙树”，因为我们爸爸和妈妈都属大龙。到了隆冬时节，万木已经凋零，我家院子里却还是绿色常新，松青依旧。

如今，每一天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仿佛依然能听见爸爸在院子里散步的脚步声；走过他的办公室，我好象又看见爸爸还坐在他那张套着土黄色布套的旧沙发上，静静地读报，专心地批阅文件；我似乎还听见，孙子们在爸爸的身旁叽叽喳喳，欢声笑语……家里一切都显得平静如常，好象爸爸并不曾远行。

每一天，当我走在大街上，看见车水马龙、熙熙攘攘，人们匆忙的脚步、街市日新月异的面貌，显示着活力和勃勃生机。正如爸爸生前所期望的那样，人民在满怀希望地辛勤工作，我们的祖国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。

而在我心里，总是觉得爸爸并没有走，他和我们在一起，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，慈爱地、带着欣慰的神情在注视着我们。



全家福，1955年8月。

我想念我的父亲，这种思念之情与日俱增。

(一)

我是家中的长女，1941年9月11日出生在太行山。

我的降生，本应会得到父母加倍的疼爱。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，正在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，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的境地。军情紧急，爸爸无法带着我率兵打仗，刚刚出生七天的我，就被托付给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抚养。两年以后，当我被接回到父母身边，已经奄奄一息，极度的营养不良，多种不知名目的疾病，使我衰弱得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父母心疼之至，却不得不把我又送进了延安保育院，因为爸爸还在打仗。我身体太弱，常常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一同到外面去玩耍。一天，刚刚两岁的我被独自留在房间里，突然，我的棉袄袖子被炭火烤着了，我拼命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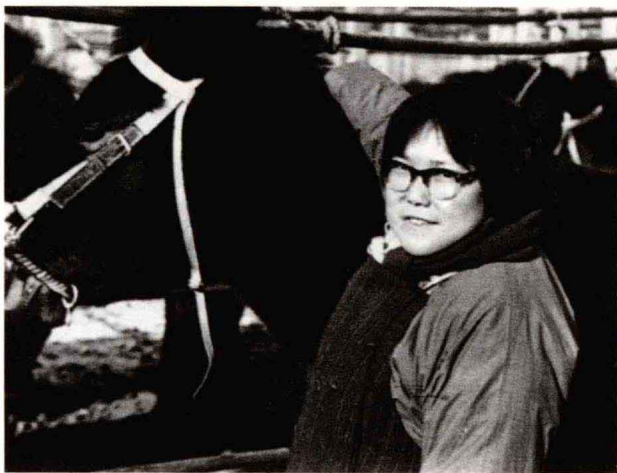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和妈妈在太行山，1938年8月。



哭。终于被一个小战士听到，救了我，否则我可能就被烧死了。直到现在，我的胳膊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烧伤的疤痕。妈妈常常对人说：“邓林小时候真是受了不少的苦。”

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，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。解放战争胜利后，从上海到四川，再到北京，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。我的病情比较复杂，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，开过刀，又长出新的瘤。爸爸下了大决心，费了许多周折，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最好的治疗。此后，我的体质虽然仍不能和我的同龄人相比，但我却也能以基本正常的体魄面对生活，建立家庭，承担责任，作出成绩。我知道，这一切是爸爸、妈妈给予我的。

全国解放后不久，爸爸调到中央工作，我们家搬进了中南海。那时候，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姊妹兄弟。爸爸、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，对我们从不娇惯。小学，我们三个大孩子



我在河北省宣化劳动，1969年。



北京家中看贺卡，1989年。

上寄宿学校，每星期自己坐公共汽车往返于远
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。上中学大家都骑
自行车。爸爸每学期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，
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，优点、缺点、性格
特长，他心中有数。但是具体的事情，他一概
不管，放手让妈妈教育我们。爸爸信任妈妈，
相信她带出来的孩子都是好的。他们两个，在
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、默契。所以，我
们家的孩子都比较正直，善良，质朴无华，也
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承担起自己的社
会责任。

妈妈曾经说过：“你们五个都已成才，都
有自己的谋生手段，你们在工作岗位上都能够
兢兢业业，力所能及作出成绩来，妈妈高兴，
爸爸也高兴！”我们可以自慰，我们没有让爸
爸、妈妈失望。

我的妈妈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
大学的学生。投身抗日，到了延安，1938年
和爸爸结婚。妈妈是个好人，朴实，诚恳，大

方，与爸爸相濡以沫、共苦同甘。妈妈心地善良，为人又厚道，又宽容，而且特别能干。想当年，我们家五个孩子的毛衣、毛裤等，都是妈妈一手织成的，织得又快又好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关押的时候，妈妈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。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窿，被妈妈修补过后，完好如初。

爸爸、妈妈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知识、有文化、对国家有用的人才。小时候，每个星期天，妈妈都会为我们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，参观啦、郊游啦、看电影啦……妈妈带我们一起浇花、种菜，教我们女孩子打毛衣，培养我们的劳动观点和生活自理能力。爸爸喜欢打桥牌，妈妈就自己先找人请教，她学会了以后再教我们。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学打桥牌，只是大胖子朴方和楠楠打得最好，多年来一直是爸爸的好搭档。妈妈自己也经常给我们讲科学知识。



我在河北省宣化造纸厂当工人，1969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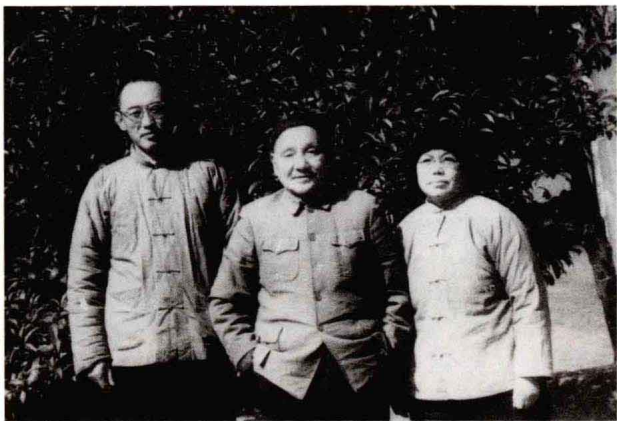


相濡以沫，1989年。

关于核裂变的原理，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听妈妈讲的。我的弟弟、妹妹有三个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，大概也是受了妈妈的影响。

我的身体多病，学习有些困难，曾几度休学。妈妈鼓励我说：“要发愤图强。”爸爸说：“不是发‘愤’，你不是跟谁生气。你应该奋发图强，自己振奋起来，争取好的成绩。”爸爸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，成为我多年来争取进步与成功的动力。妈妈为了我的学业费了许多心思，最后给我请了一位中国画老师，让我学习画中国画，既能适应我的身体条件，又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。今天我能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，成为一个画家，我十分感谢妈妈为我所作的选择和安排。

现在想起来，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多么车福、美好！我们无忧无虑，我们快快乐乐，我



爸爸、妈妈和王瑞林在江西，
1972年冬。

们学习都非常努力。几个弟弟、妹妹在学校都是优秀学生，还当学生干部。回到家里，我们感到温暖，充实。说句实话，那时候，对于父亲的了解真是太少，太少。他的职位有多高，他的权力有多大，我们都不大清楚，也不太关心。只知道爸爸是党的下部，为党工作是他的天职。因此我们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。

我们都爱我们的父亲，我们都爱我们这个家。

但是后来，我们没有家了。那个疯狂的年月打碎了一切。

1966年6月，一场风暴无情地摧残着整个中国大地，一切尊严、秩序都被扫荡殆尽。法律、信念、道德、感情被撕扯得支离破碎。正直的，无所适从；疯狂的，随心所欲。中国正在向何处走去？！

当时，我的父亲还正在他自己的岗位上。他曾期望能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，阻挡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，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

但是没过多久，我的爸爸被宣布为“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要求“全党共诛之，全国共讨之”。爸爸被彻底打倒了。

我们的爸爸，那个曾经出生入死、驰骋疆场、屡建战功的爸爸；那个兢兢业业、日理万机、受人尊敬的爸爸——他和我们的妈妈并排站在院子中间，被人群围着。人们吼叫着，挥舞着拳头，凶狠地强迫爸爸、妈妈低头、弯腰……我们几个孩子被惊呆了，心里害怕极了！

我回到学校。学校早已经没有课上了。到处口号声震天，大字报铺天盖地。熟悉的面孔突然变得冷若冰霜。呵斥、批斗、漫骂、吐口水……我觉得我们全家像是被一阵恶风浊浪抛向了无底的深渊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……

“好心人”跑来劝我说：“赶快和你爸爸划清界限，揭发他的问题吧！”我哭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爸爸究竟犯了什么错误？我更不明白，

植树育人，1985年。



我和我年幼的弟弟、妹妹们究竟做错了什么？

运动刚刚开始不久，我曾经问过爸爸：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爸爸回答说：“你们自己考虑。”

命运逼迫我们去了解父亲，认识父亲。我们必须独立思考，不能有任何依赖、幻想。

我和两个妹妹骑上自行车，跑到中组部、中宣部、统战部等机关去看大字报，想看看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。结果只看到“白猫黑猫”等几条所谓的“罪状”。

爸爸没有问题。我们自己这样认为。

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还容不得想，我们全家就陷入了愈加艰难的境地。

爸爸和妈妈失去了自由。全家人都不能、也不敢和他们说话，如果被人听到，说我们通风报信，说我们串供，他们的处境就更难了。

美术学院宣布不许我回家，还要我参加批斗大会，揭发、批判我的爸爸。我因为内分泌



爸爸、妈妈和奶奶在江西，
1972年冬。



三代人，1980年。

失调，多年来患有嗜睡症。有一次开批判会，会场上高喊着“打倒邓小平！”的口号，可我居然睡着了。事后，我因此而遭受批判。

朴方和楠楠在北京大学遭受围攻、逼供。他们说朴方是“小邓小平”，对他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，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……最终酿成终身残疾的悲剧。这是我们全家最伤心的事。妈妈为此哭伤了眼睛。

爸爸被打倒之后，我被关进“牛棚”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敢理我，也不许我回家。我天天想家。不知道爸爸、妈妈、奶奶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他们了。有一天，我请假上街去买日用品。出了美术学院的大门，我突然想到家，我要回家去看看爸爸，见见我的亲人们。心里这样想，脚底下走得飞快，直向着中南海里那个我日夜思念的家。

我从后院的小门溜进了家。爸爸、妈妈、奶奶都在，弟弟、妹妹们都不在。爸爸沉默，妈妈显得疲惫，有些憔悴，奶奶还是老样子。



战争年代，1946年。

看见我回来，他们露出了笑容。我心里非常激动。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我都说了什么，听了什么。或许就是我谈谈我的情况，听听他们的情况，弟弟、妹妹们的情况……这在当时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、多么珍贵、多么迫切想要知道的消息！然而，对于我，更重要的，是我的胜利。我回到了家，见到了我的爸爸、妈妈。这是我第一次在逆境之中经过斗争，运用自己的智慧，争取到的应得的权利。

挫折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。其中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搬家，打包，捆行李。在那动荡的年代里，我们被到处驱赶。子女的聚、散、归、离暂且不算，就是以爸爸、妈妈为中心的我们的大家，十年之间，一共搬过七次。除去江西那三年，我们几乎每年都得搬一二次家。

1967年9月，我还被关在美术学院里。一天，突然通知我赶快回家。回去一看才知道：限令我们五个孩子和奶奶两个小时搬出中南海。

两个小时！天哪！那可是那么大一个家呀！不容迟疑，不许争辩，不能抗拒。我们闭着嘴，用最快的速度把可以带走的生活必需品打包，装车，离开了中南海。

爸爸和妈妈被留在中南海，单独隔离起来。

分离的时刻，我们不能叫一声爸爸、妈妈，不能和他们说一句话。看着爸爸、妈妈凄凉、无助的身影，心里难过极了！我有多少话想对他们说，哪怕只说一声：“爸爸、妈妈多多保重！”可我什么都不能说，连哭都不能哭。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，扭过身去，不敢再看那别离的场面。我们五个子女和奶奶一起，被送到方壶斋的两间小屋暂住。没有爸爸、妈妈在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们没有家了。

1969年，我已经随美术学院的同学一起被送到河北宣化部队农场，接受再教育。我在那里当过造纸厂的粗筛工，当过酱油厂的洗刷工。更多的时间我是和大家一起“修理地球”，翻地、种水稻、挠秧、拔草，什么活都干。

爸爸、妈妈和初生的眠眠在江西，1972年冬。

